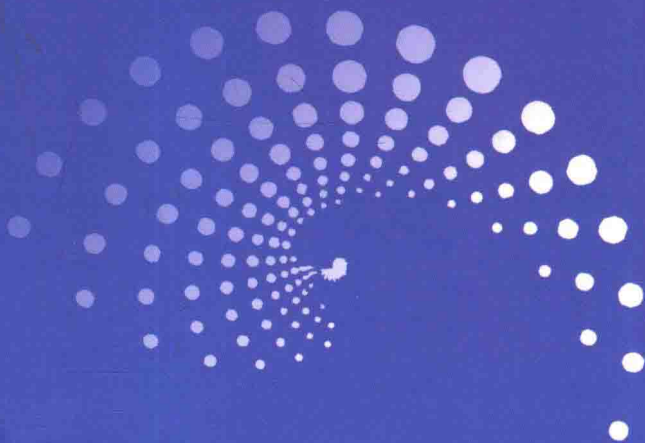


政治哲学视野 的网络政治文化论纲

ZHENGZHI ZHEXUE SHIYE
DE WANGLUO ZHENGZHI WENHUA LUNANG

汪业周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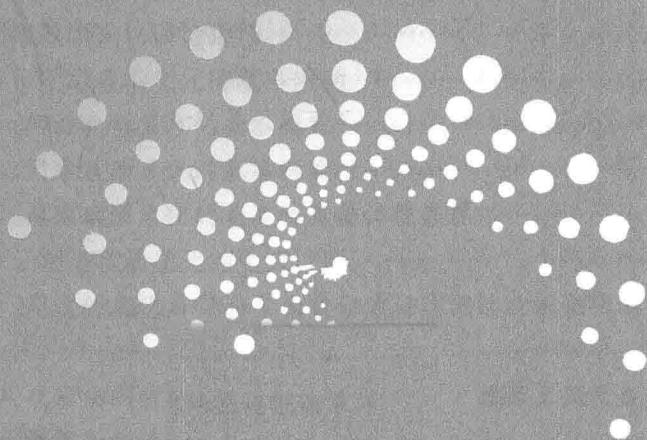
南京大学出版社

南京邮电大学人文社科研究基金项目（NYS215005）资助；
南京邮电大学物联网产业发展研究基地科研项目资助。

政治哲学视野 的网络政治文化论纲

ZHENGZHI ZHIXUE SHIYE
DE WANGLUO ZHENGZHI WENHUA LUNANG

汪业周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政治哲学视野的网络政治文化论纲 / 汪业周著. —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7

ISBN 978-7-305-18968-5

I. ①政… II. ①汪… III. ①互联网络—影响—政治
文化—研究 IV. ①D0-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64064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书 名 政治哲学视野的网络政治文化论纲

著 者 汪业周

责任编辑 黄隽翀 编辑热线 025-83685720

照 排 南京南琳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960 1/16 印张 12 字数 205 千

版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18968-5

定 价 40.00 元

网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号: njupress

销售咨询热线: (025) 83594756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网络政治文化何以可能	1
第一节 网络政治发展的政治哲学求解	2
一、网络政治研究进展	2
二、网络政治萌生的现实基础	5
三、网络政治的一般特性与中国网络政治的特殊性	12
第二节 解读网络政治的新视角:网络政治文化何以成立	23
一、网络政治文化生成的实证分析	24
二、网络政治文化成立的学理分析	26
第三节 对相关研究成果的清理与总结	31
一、研究基础	31
二、研究方法	38
三、研究思路	41
第二章 网络政治文化理论架构	45
第一节 网络政治文化的基本内涵	45
一、网络政治文化的基本规定	46
二、网络政治文化的基本功能	51
三、网络政治文化的基本特点与性状表现	55
第二节 网络政治文化的生成机理	60
一、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培育网络政治文化的观念前提	60
二、政治实践特别是网络政治实践是网络政治文化生成的直接土壤、空间和场域	67
三、多样态政治文化和网络文化是网络政治文化的直接理论来源	73

第三节 网络政治文化的基本属性	83
一、开放性是网络政治文化发展的根本属性	83
二、发展的阶段性:坚持文化自觉与立足实际的统一	84
三、构成的多样性:坚持主导性与多样性的统一	90
四、能力的自强性:坚持科技、市场与文化的统一	95
第四节 我国网络政治文化发展的制约因素	100
一、技术制约因素:发展网络新技术,创新网络政治管理	100
二、主体制约因素:网民数量上的膨胀难掩背后存在的深层问题	101
三、制度制约因素:全球互联网至今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法治环境	102
第三章 引领网络政治文化发展的核心理念	104
第一节 理性理念	104
一、网络政治应当是理性政治	104
二、构建理性网络政治文化	111
第二节 公共理念	112
一、公共概念基本含义	112
二、构建公共网络政治文化	114
第三节 人本理念	119
一、人本主义思想资源与人本内涵	119
二、构建人本网络政治文化	122
第四章 理性网络政治参与:网络政治文化的生成源泉	124
第一节 网络政治参与研究学术清理	125
一、国外关于网络政治参与的研究	126
二、国内关于网络政治参与的研究	132
三、网络政治参与研究的理论框架	137
第二节 网络技术发展与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内在机理	139
一、网络技术发展与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之间的内在规律	139
二、网络技术发展与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互动框架	140

三、网络技术发展视阈下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实践路径	140
第三节 网络政治参与的基本诉求:走向理性网络政治参与	142
一、理性网络政治参与的基本内涵	142
二、成立依据与应当解决的若干矛盾	143
三、理性网络政治参与实证分析与模型设计	145
第四节 理性网络政治参与与网络政治文化建设	146
一、网络政治文化生成发展的基本背景	147
二、理性网络政治参与与网络政治文化的相互作用机理	148
第五章 构建理性网络政治文化的实践进路	150
第一节 空间培育:塑造中国特色的网络公共领域	150
一、中国网络公共领域的基本特征	151
二、中国网络公共领域功能初现	152
三、中国网络公共领域的生长	155
第二节 主体塑造:多方全面促进公民网络参政	156
一、科技发展与主体成长的双向建构	156
二、作为一种新型民主形式的网络参政	156
三、推进网络参政制度化	157
第三节 制度完善:形成网络政治文化发展的规范体系	158
一、制定网络法律,规范公民网络参政行为	158
二、加强网上信息管理,净化网络空间	158
三、健全网络伦理规范体系,提高网民道德素质	159
第四节 国际合作:深化网络治理的全球协作	159
一、国际网络治理现状	159
二、构建网络治理国际合作新格局	162
结语 文化“三自”:自觉、自信与自强	164
一、文化“三自”基本内涵	164
二、“文化强国”战略提出的时代背景与价值解析	165
三、文化强国的建设方略	170
主要参考文献	175

第一章 网络政治文化何以可能

生存方式的变迁必然带来思维方式的变革,反之,思维方式的变革引领和促进生存方式的发展。维特根斯坦曾说过:“是人的生存方式决定哲学的思想方式和言语方式而绝不是相反。”当代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期,中国人的生存方式发生着质性跃迁,变化领域之广泛与程度之剧烈不仅正在颠覆着传统生存方式,也迫切呼唤人类对自己生存方式的反思方式进行变革。在现有政治哲学的思想资源中,从整体上把握政治的概念很多,如自由、平等、公平、正义、人权等。这些概念本身自然体现和包含了重要的理论体系和分析方法,但在追问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诸多问题存在的根源时,我们发现很多问题的存在其实是互为因果的,撇开具体历史文化和现实国情,抽象地谈论政治问题的努力,因其忽视了政治发展的现实基础和具体条件,不仅在方法论上没有达到马克思主义当年的高度,也无法在实践中找到诸多“中国问题”的破解之道。可见,从现实问题出发,从研究对象中概括、创新概念,构建起满足时代发展和中国实际需要的新的理论体系,为当代中国的现代化提供思想资源,对于当代中国发展至关重要。^①

互联网的崛起引起了人类社会全方位的改变。作为一种全新的信息技术范式,互联网对人类社会最大的影响在于它塑造了一种新的社会生活场景,这是一种不同于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全新社会生活场域,卡斯特将这种新的社会形态称作“网络社会”。在卡斯特看来,当前的信息技术革命的确对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互联网技术与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的相互作用,重新塑造了人类的生活场景,一种新的社会场景——网络社会正在浮现。卡斯特说:“分析信息技术革命对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与影响,

^① 马克思说:“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着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页。

因为这些戏剧性的技术变迁,是当前最直接感觉到的结构性转化。但是这并非认为技术决定了社会,而是技术、社会、经济、文化与政治之间的相互作用,重新塑造了我们的生活场景。”^①“在这一新社会形式中,人们以一种多元化、去中心、平面化的方式生存与互动。”^②面对这样一种新的社会结构和生存方式,结合我国独特的历史文化与现实政治经济状况,深刻体会认识网络与政治、与文化的关系,凝练概念解释与分析工具,揭示深层意蕴及其社会影响,无疑是我们全面而深刻认知和把握网络社会的一个重要角度。

第一节 网络政治发展的政治哲学求解

强烈的“问题意识”是马克思新世界观出场的基本路径。“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每个时代的谜语是容易找到的。这些谜语都是该时代的迫切问题”。^③对其所处时代之谜的不断追问,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基点和导向,也是我们透析现实问题的基本方法。网络对政治的影响广泛而深刻,对于网络政治这样一种新型而重要的政治形态,需要我们站在政治哲学的高度给予理解和把握。

一、网络政治研究进展

网络政治是互联网上客观存在的、与社会政治生活密切相关的关于政治权力、政治意识、政治体系、政治行为、政治管理、政治参与、政治发展等内容的政治现象。^④美国学者马克·斯劳卡在其著作《大冲突:赛博空间和高科技对现实的威胁》一书中提出了“虚拟现实的政治”的概念——是指那些有可能永远地模糊真实和虚幻之间的界线的技术,将给政治带来的影响。托夫勒在《创造一个新的文明:第三次浪潮的政治》中指出:“第三次浪潮不仅仅是个技术和

① [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5页。

② 黄少华:《论网络空间的社会特性》,《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3页。

④ 李斌:《网络政治学导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12页。

经济学的问题。它涉及道德、文化、观念,以及体制和政治结构——正如工业革命摧毁了先前的政治结构,或者使得这种政治结构丧失意义一样,知识革命——以及它所发动的第三次浪潮变迁——将对美国 and 许多国家产生同样的效果。承认这一历史事实的政党和政治运动将生存下去。”德国学者巴巴拉·贝克尔认为:“在网络社会中,一组代码、一个角色符号,便成了身份的维持物。网络主体身份的这些特别的因素,使得我们在理解网络主体时,必须从一种新的角度来考察我们平时所说的‘身份’。”霍华德·莱因古德提出了虚拟社区的概念——虚拟社区是指以虚拟身份在网络中创立的一个由志趣相同的人们组成的均衡的公共领域。霍华德·莱因古德还总结虚拟社区的一些特征,他认为:“在虚拟社区中,有的社区与真实生活中的社区几乎一模一样结构复杂,既有社会等级,也有官僚制度。”

根据陈潭、罗晓俊的研究^①,国内网络政治研究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一是起步阶段(1994—1998):这个时期,互联网研究刚刚起步,CNKI 核心期刊上与网络政治相关的论文数量每年都有增长,但增长速度较慢,1998 年达到历年文章数量的顶点,却也仅有 64 篇。从文献内容上看,这些文献多是对国外互联网建设状况的介绍,讨论本国互联网建设状况的不多,文献风格多为评议型,如《政府上网了大众要跟上》^②等,这表明学术界对于互联网这一新兴事物仍保持着好奇而又谨慎的态度。而互联网研究的系统化和技术化要归功于政府的推动,1997 年,国务院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授权中国科学院组建和管理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这是中国第一个互联网研究机构。此后,CNNIC 每年对中国互联网发展情况进行两次统计,其统计数据为学者们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权威的参考资料。此外,在这一时期,一些经典的外国文献被陆续引入国内,如《数字化生存》、《未来之路》等,成为对中国迈入网络时代影响较大的启蒙读物。而国内研究成果则略显单薄,1997 年出版的《网络为王》^③成为国内首部全面介绍互联网的著作,但该书中对网络政治现象的专门探讨不多。二是成长阶段(1999—2005):1999 年,中国发起了“政府上网工程”,随后两年内“企业上网工程”和“家庭上网工程”亦陆续启动,互联

① 陈潭、罗晓俊:《中国网络政治研究:进程与争鸣》,《政治学研究》2011 年 4 期。

② 智英、遥力:《政府上网了大众要跟上》,《计算机与网络》1998 年第 7 期。

③ 胡泳、范海燕:《网络为王》,海口:海南出版社 1997 年版。

网在中国的迅速普及预示着网络研究大潮的来临。从 CNKI 检索情况看,自 1999 年起,网络政治相关文献数量成几何级数增长,到 2001 年突破 300 篇,是 3 年前的 5 倍。2002 年增速稍缓,2003 年又进入第二轮急速增长期,2004 年突破 500 篇。由于刚刚起步不久,研究主题仍较为单一,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电子政府”的讨论,该领域的论文占了论文总量的一半,国内信息化专家围绕电子政务问题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全面分析了电子政府的建设环境、建设意义、基本模式、现有困难和社会影响等,并自 2004 年伊始对电子政府的发展趋势进行年度性预测,为电子政府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①;另一方面,互联网发展欣欣向荣的同时,网络黑客、网络诈骗、网络侵权的现象开始进入公众视野,因此“互联网安全”成为政府部门关心的第二大课题。从 2001 年至 2005 年,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指南政治学方向共发布过 4 个与互联网相关的主题,其中 3 个为“互联网条件下的国家安全问题研究”,这从一个侧面表现出国家对互联网小心谨慎的提防态度。从著作出版情况上看,更多国外经典著作被翻译成中文,如我们耳熟能详的曼纽尔·卡斯特(Mnuel Castells)的“信息时代三部曲”、米切尔(William J. Mitchell)的《比特之城》等^②。与此同时,国内学者也在不断地探索和总结中成长,并发表了一系列优秀的成果:1999 年,论文《网络政治学解读》中首次明确提出了“网络政治学”的概念,对网络政治学的基本要素和内涵进行了介绍;2002 年,《网络政治:网络社会与国家治理》出版,该书从网络政治的研究范畴、网络政治的基础理论、网络空间的虚拟政治现象、网络对政治生活的影响、网络社会的国家治理及网络政治的发展趋势六个方面对“网络政治”的概念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探讨。有学者看到了 20 世纪的政治学在回答由网络引起的政治问题时产生的危机,纷纷呼吁国内开辟网络政治研究领域,他们分别在自己的论文中对网络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基本任务和关键问题进行了阐释。这段时期内,一些挂靠在省社科院及地方高校的互联网专门研究机构也陆续成立,这其中包括天津

① 参阅汪玉凯:《电子政务基础知识读本》,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 2002 年版;《电子政务与政府职能转变》,《电子政务》2005 年第 1 期;周宏仁:《电子政务全球透视与我国电子政务的发展》,《计算机安全》2002 年第 10 期;《信息革命与信息社会的黎明》,《网络与信息》2001 年第 1~4 期等。

② 曼纽尔·卡斯特的“信息时代三部曲”,包括《网络社会的崛起》、《认同的力量》、《千年终结》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分别于 2001、2003、2003 年推出。威廉·米切尔:《比特之城:空间·场所·信息高速公路》,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 年版。

市社会科学院舆情研究所、北京大学网络经济研究中心等。三是发展阶段(2006—)：由于网络政治权力、网络政治参与、网络政治民主等主题的关注度不断提升，文章数量大幅度上涨，历年来处于一枝独秀地位的电子政府研究在总体研究热度不断攀升的情况下，论文所占比重相对减少。在新兴的话题中，网络政治参与相关文章数量的增幅最大，这表明随着互联网覆盖范围的拓宽和深度的推进，网络政治研究者们开始真正关注起互联网的草根特性以及网络主体的行为价值和政治意义。这种学术视野的拓展在国家社科课题基金项目分布情况中也反映出来，这表明“网络政治”走出了以“国家安全”为唯一命题的阶段，而进入多主题繁荣并存阶段。这一时期，国内推出了一系列网络政治与治理的优秀著作，例如《网络政治学导论》、《众声喧哗》、《我们的防火墙》等^①。从研究机构的成长上看，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是2008年“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的成立，该室建立了一套较完整的网络舆情监测体系，并编辑发行了第一本有国家正式刊号的网络内参《网络舆情》，在舆论压力指数测试、网络人文地图绘制以及网络突发事件案例库建设上做出了显著贡献。

通过对CNKI的相关文献及国内外主要著作的阅读和分析，网络政治研究的主要论题和内容表现在网络政治主体、网络政治权力、网络政治行为、网络政治文化及网络政治民主等五个方面，这里不再转述。

二、网络政治萌生的现实基础

1. 网络时代的来临催生网络政治的生成与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类大踏步迈入了信息时代。作为一种全新的技术和工具，网络的出现冲击着人类的实践方式和思维方式，改变着公民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成为公民基本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马克思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技术如何展现)，用什么劳动资料(技术的展现)生产。”在《资本论》第二版时，他在“怎样生产”这句话的后面特意作了一个重要的注释：“从工艺上比较各个不同的生产时代”。列

^① 李斌：《网络政治学导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胡泳：《众声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李永刚：《我们的防火墙：网络时代的表达与监管》，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宁也指出:“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不言而喻,没有这种观点,也就不会有社会科学。”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弗勒曾说过:“谁掌握了信息,控制了网络,谁就将拥有整个世界。”

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网络的政治作用开始成为多学科研究的焦点议题(Davis & Owen, 1998; Bimber, 1998; 2000; 2001)。随着研究的深入,社会科学研究者已经认识到,网络不仅能影响常规政治,而且还深深地影响着一个国家(地区)的民主进程和政治生态的发展。相关的研究包括不同的面向。其中,网络的社会政治含义、网络与市民社会的发展、网络在社会运动中的角色等成为关注焦点。国内外学界、政界对于网络在促进社会变革进程中的作用基本达成共识,但对于其在政治生活中究竟能否发挥实质性作用的认识并不一致。持乐观态度的学者认为,网络促进和扩大了公众的政治参与,推动了政治民主化进程。持悲观态度的学者则认为,由于网民自身原因以及国家体制或制度的制约,网络不可能在政治生活领域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网络对包括公民政治生活在内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业已产生显著影响,而且这种影响的领域和程度还在继续扩大与加深。互联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普及,能够为公民进行有序政治参与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丰富了政治参与的渠道和手段,扩展了政治参与的主体,在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的主动性和能力素养方面具有重要影响。近年来,我国公民的网络政治参与热情与日俱增,已经渐渐习惯于利用互联网络进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表达权益诉求,网络政治参与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力。2011 年我国公民通过互联网高调宣布参选人大代表就是最好的例证。互联网也日益成为各国政府及其领导人进行治国理政、听取和掌握公众权益诉求的新平台,成为联通政府与民众的桥梁纽带。许多国家党政领导人通过开通政治博客、微博等方式与民众进行更为直接的交流沟通,或者与网民进行在线交流。2008 年 6 月 20 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人民网上注册了强国博客,通过“强国论坛”同广大网友进行“面对面”在线交流,标志着网络民意进入公共决策体系。2009 年到 2011 年,温家宝总理连续三年在“两会”召开时通过中国政府网与新华网与网友在线交流,引起了海内外的高度关注。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网络政治参与已经日益成为信息时代公民政治参与模式的新方式和新趋向。

2. 转型期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催生网络政治

社会转型期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重要阶段。福柯指出,传统社会建立在信息资源垄断基础上的社会治理模式发生了从“全景监狱”到“共景监狱”的根本性转换。当代中国正处于这样一个重要阶段,推进中国社会顺利转型,民主政治的发展既是内生动力,又是基本内容,更是重要标志。与此相呼应,“公众参与”话语逐渐由边缘走向公共议论舞台的中心。从事实上看,党和政府对参与式治理已有方向性共识。中共十六大报告指出:“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十七大报告指出:“增强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制定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公共政策原则上要公开听取意见。”在实践中,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社会结构的变迁、权利时代公众主体意识的觉醒、现代社会对公共生活的“公共性”吁求,都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个方面推动了公众参与的兴起,各种形式的公众参与已经成为中国公共生活领域种的一道独特风景。特别是网络时代催生的网络政治发展迅猛,公民政治参与的意识、行为、思维以及政府态度、现有政策导向等发生显著变化,网络政治参与成为扬弃传统政治参与的可行、有效选择和重要补充,已经或正在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网络时代与转型阶段的耦合更加凸显了网络政治参与在公民政治参与体系中的独特、重要地位和作用,重构国家、政府、社会、公民的关系,推进网络政治发展,不仅具备了充分的必要性,而且提供了现实的可行性,日趋成为政治民主化程度的“晴雨表”。2009年12月31日,知名网站“中国选举与治理网”入选《南方周末》“网络单元——年度网站”,主办单位的致敬词曾这样写道:“知屋漏者在雨下,知政失者在网络。这是网络时代的中国特色。”

3. 网络政治生成的技术基础在于网络的政治功能

如果说网络政治生成的社会基础为网络政治的出现提供了社会条件,那么,网络政治之所以异质于现实政治,还在于网络这一技术基础具有的政治功能。主要表现在:

一是网络是传递政治信息的新型中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改革遵循的是简政放权,地方的相对独立性有所强化,使“地方”也成为当地政治信息的制造中心,这样就出现了政治信息制造中心的多层次化。从政治信息的传递与反馈方面讲,我国存在传递、反馈环节多,层层加加码的问题。从中央到

省(市、区)、市(地区、州)、县、乡镇(街道办事处)、村(居民区、企业),多达六个环节。中央下达任务,地方为保证完成任务,存在层层加码的问题,基层向中央反映问题,中间所经各环节有层层减码的倾向。网络的传媒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从这一层面来看,网络为传递政治信息提供了一种新型中介:(1) 网络对政治信息的传递成为政治系统正常运行的一种润滑剂。所谓传递政治信息,实质就是“国家意志”和“民间意志”的相互交流与沟通。网络出现后,从自上而下的角度,国家政策在传统传递渠道基础上借助网络增强了传递的及时、快捷和准确性;从自下而上的角度,公众的愿望借助网络增强了传递的及时、全面和便利性。这样,网络传递畅通了上下相连,增进了相互了解,强化了沟通和共识,使得政治决策可以最大限度地获得公众的支持。因此,网络传递的实质是能够向政治系统输送了强大的社会动力。(2) 网络传递政治信息可以为政治决策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在社会转型期和改革深化期,诸如失业、环境、教育和医疗等各种社会问题不仅关系到人民的切身利益,也是政府面临和着力解决的重大社会问题。解决这些问题一方面必须要出台一系列政策,而政策往往难以兼顾群众的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不同地区和不同阶层的所得与付出之间的平衡,这需要群众对政策有一个理解和承受的过程。网络在这一过程中能起到积极的作用。它借助具体的“形象”,用通俗生动的方式提出问题,阐明背景,发表意见、评论或分析,帮助群众认清自己的生存环境,启发群众适应政策的主动性。另一方面,这些社会问题生成的原因以及政府解决的决心、进程等也可以通过网络让公众及时了解,有利于为决策营造良好氛围。在实践中,网络的这一作用已经在价格改革、住房改革中得到显现和证明。(3) 网络传递政治信息有助于树立正确的舆论导向。通过网络,传递国家大政方针、目标规划、具体步骤,传递与公众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大量信息,传递改革发展的巨大成就和和平稳定的国际关系,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有助于引导社会成员的注意力聚焦国家发展目标,形成正确舆论导向,凝聚人心,振奋精神,增强思想宣传工作的吸引力、说服力、感召力。

二是网络可称为“第五种权力”。道格拉斯·卡特曾指出:“新闻媒介是政府的第四大部门,可以监督立法、行政、司法三权。”这个说法在今天已经被人们广泛地接受。人们把网络的出现称之为“第五种权力”。网络虽然不是一种实在的物质权力,它不能向任何人发号施令,更不能直接调动国家的军队和武

装力量,不能支配财政收支,也不能制定法律、做出司法裁判。但作为大众传媒的一种,网络是以民意代言人的身份出现的。报刊需要发行量,电视需要收视率,而网络却摆脱传媒受资本垄断或少数技术精英控制的局面。它虽然不是立法权和司法权,也不是财权和军权,但它是舆论的权力和道义的权力;它不是刚性的权力,而是一种无形的、柔性的权力。人们不必服从它,但不能忽略它。作为“第五种权力”,网络的作用十分广泛,其中,监督和制约政府部门的作用尤为突出,即便是政府部门的相互监督和专职监督部门行使监督权力也需要借助于网络的力量。

三是网络创造了“阳光政治”的新平台。十七大报告在论述“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时指出,“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是党的政治报告首次形象地提出“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引起各界高度瞩目和舆论的热烈反响。“不受制约的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意味着必须对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制约。“阳光政治”相对于政治过程中的“暗箱”操作而言,“暗箱”政治容易产生政治信息的错误解读。“阳光政治”是政治事务公开化、透明化的民主政治。网络的出现为创造“阳光政治”提供了一个平台,推进了政治民主化的进程。民主政治必须使政治事务公开化、透明化,使公民在充分了解情况的条件下做出他们的决定。它还要使受公民委托的政府官员处于公众的监督之下。有人比喻说,在民主政治下,政策的制定、执行与政府的政治活动以及政府官员与民众的关系应该暴露在阳光下,经得起公众的审视与考验。另外,网络为公民了解政府的工作提供了经济快捷的渠道,通过网络,公民最贴近地了解到政府的工作过程,使政策的制定、决策和执行过程透明化。

四是网络搭建了政府与公民对话的新渠道。一位教育家曾说过:“对话性沟通超越了单纯意义的传递,具有重新建构意义的功能。^①”国际政治领域中充满着形形色色的对话,国家内部也需要政府与公民之间的畅通的对话渠道。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网民规模的迅猛增长以及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为政府与公民的良性互动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平台。顺畅通达的电子访问打破了身份的限制,削弱了等级观念,为自由平等的交流铺平了道路。普通公民通过网络访

^① 钟启泉:《对话与文本:教学规范的转型》,《教育研究》2001年第3期。

问国家元首已不再是天方夜谭。网络也使政府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收集各种意见,并获取信息反馈,避免了多层过滤使信息失真。

但可能还不是现实。实现对话、提升对话质量、走向常态化,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着力:一是转变角色。要实现政府与公民的良性互动,就必须改变二者之间传统的按照等级制原则建立起来的等级关系,以平等、对话、协商的理念来处理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就政府而言,在网络时代,政府再也不是传统上的发号施令者、控制者和命令者,而是更多的扮演着协调者、帮助者和支持者的角色。在丹哈特看来,政府作为协调者与支持者的角色即是“公共官员不再只扮演服务供给者的角色,他们将越来越多地扮演调解、协调甚至裁决的角色”^①(顺便说一句,这些新的角色要求他们具备新的技能——不是管理控制的传统技能,而是调停、磋商和解决冲突的新技能)。只有政府角色转变之后,公民才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公共过程,并就公共事务表达意见、建议与想法;也只有政府角色转变后,政府才能从具体事务的干预中分出来,实现职能的根本转变,真正还权于市场、还权于社会、还权于公民,从而实现政府与公民的良性互动。就公民而言,在网络化背景下,公民获取信息的机会、能力与速度空前增强,公民再也不是传统上的那种被动的服务接受者、顾客或消费者,而是有着主动精神与积极参与精神的自由主体,正如博克斯指出的:“民众期望在公共生活中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而不只是作为搭便车者和看门人。”^②公民角色的转变表明,一种具有“完整公民资格”的“新公民角色”正在出现,这种“新公民角色”的特征是:既不是政府或统治者的工具或臣民,也不是消极、被动接受政府管制和服务、对政府言听计从的“木偶”,而是有着独立思考、判断、反思、选择精神和要求参与治理的公民;不仅关心与己有关的事务和利益,而且对公共问题和公益也持有普遍、明智和各式各样的关心。“新公民”角色的出现表达了公民与政府积极合作参与公共事务的愿望,为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良性互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二是建立机制。包括:① 协商机制。协商机制作为政府与公民间的一种平等有效的沟通形式,它能使公民意见、建议与想法顺利有效地进入政府系统,从而实现政府与公民的良性互动。协商机制的建

① [美]罗伯特·B.丹哈特,珍妮特·V.丹哈特:《新公共服务:服务而非掌舵》,《中国行政管理》2002年第10期。

② [美]理查德·C.博克斯:《公民治理:引领21世纪的美国社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7页。

立,一方面要求政府在工作方法上要走群众路线,拓宽沟通渠道,在涉及群众的事项上,政府必须破除“官本位”思想,树立“民本位”思想,与群众建立起一种协商、沟通、交流、讨论甚至辩论的环境,共同促进事情的解决;另一方面,在协商过程要让不同群体的利益都能有表达的机会,以“确保我们可以在过程中听到不同演讲者针对不同主题的不同意见”^①。此外,政府与公民间的协商机制要用制度的形式确定下来,以适应公民参与的需要。^②信息共享机制。信息共享机制要求在政府与公民之间建立一种无障碍的信息沟通系统,减少信息沟通中的不对称和暗箱操作,实行阳光下的政府信息运作。信息共享机制的建立最主要的是要完善电子化政府建设、实现政务公开和网上办公,完善政府的信息披露制度,使公民能够及时、平等地了解政府的信息流程,而公民的意见、建议与批评也能够及时地反馈给政府,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良性互动。三是重塑信任。政府要以崇高的道德价值和诚信来带动整个社会的诚信与道德,不断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用高质量的公共服务来获得社会公众的信任。增强政府对公民的信任,认可公民的力量,尊重公民意见,愿意同公民一道分享治理的权力,实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与民主监督。托马斯·杰斐逊指出,最好的政府应该“由有知识、有教养和积极参与的公民来治理”^③。这就要求政府做到以下几点:一是建立重大事项的民主决策机制和调查机制,让群众享有知情权和参与权,让群众参与决策;二是建立群众评议政府绩效的机制,充分发挥群众的监督与评估作用,不断提高政府公共服务的效率与质量;三是适时推出一些政府与群众沟通的专题活动,如热线电话、社区活动、专员活动、答疑活动等,使群众切身感受到政府存在的意义,并从这种感受中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从而形成对政府的信任关系,最终达到政府与公民的良性互动。^④

① [美]凯斯·桑斯坦:《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7 页。

② [美]理查德·C.博克斯:《公民治理:引领 21 世纪的美国社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2 页。

③ 网络时代构建政府与公民良性互动机制的探讨, <http://www.21gwy.com/ms/zxzl/a/5515/765515.html>。